

# 陳寅恪詩箋釋二題

意甚兄在右 昨夕晤大烟 知小甥有歸  
 憂化之病 頃在戒 命受年時 頗為學究 為  
 念之甚 各中央 弟愧不能 常之則 則  
 至河日 各近便 入廣身 兩價本 較港為 廉  
 近雖因 飛免 閱傷 然亦不 多 窮民 明叔 都 航  
 望未 往 及其 地 費 相 甚 能 也 想 丹 病 必 決  
 動 年 終 若 國 四 年 可 信 託 之 醫 院 則 可 再 強  
 世 一 之 務 每 處 所 元 信 必 已 算 畢 及 之 上 矣  
 前 接 昆 明 清 榮 會 計 科 信 云 教 育 部 寄  
 來 三 千 元 交 弟 收 交 法 言 浩 以 書 留 杭  
 立 武 所 言 之 補 助 費 也 弟 即 復 清 榮 會  
 計 科 詳 請 其 務 共 三 千 元 電 匯 至 重 慶  
 交 航 立 武 折 換 票 金 作 另 單 呈 康 勤 而 備  
 三 百 餘 元 一 部 但 願 時 至 渝 不 知 究 能 折  
 合 若 不 也 弟 子 病 仍 甚 大 起 也 弟 則 定 八 月 廿  
 日 搭 船 行 矣 所 失 甚 亦 身 前 且 留 體 也  
 昨 因 彭 甚 相 在 北 以 傷 寒 病 死 弟 因 此  
 自 慮 年 長 者 不 必 皆 免 死 體 弱 者 尤 不 必  
 弱 體 壯 者 先 死 彭 公 年 少 於 我 其 體 尤 強  
 於 我 故 也 弟 可 祈 齊 彭 賜 一 生 死 之  
 意 耶 晚 候  
 健 祝 益 稅 弟 寅 恪  
 親 友 諸 公 向 候 甚 願 弟 作 著 乞 恐

陳寅恪1939年8月6日致傅斯年函，內容多及親友疾病

胡文輝  
 廣州羊城晚報

## 暗斥馬列主義

陳寅恪五十年代有《經史》詩云：

虛經腐史意何如，溪刻陰森慘不舒。競作魯論開卷語（一稿作：見說魯論開卷語），說瓜千古笑秦儒。

蔣天樞先生曾指出：「昔年先生嘗語樞：在德時曾讀德文版馬克思《資本論》。此殆後來《經史》詩之所由作歟？」<sup>①</sup>朱新華先生由蔣說引申，認為：

這「經史」絕不可能取其傳統意義，因為此一意義的經史乃是寄託著他幾乎全部感情的「聖籍」（語見1964年贈蔣天樞詩），決無加上「虛腐」、「溪刻陰森」一類評語之理。我以為它指的就是講習會上所學的理论。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，從陳寅恪的角度看，顯得嚴酷可怕。聯繫他以往對俄國式共產主義的恐懼（參看浦江清《清華園日記》一九四八年部分，三聯書店版）及毛澤東關於中國將向蘇聯「一邊倒」的宣告，陳寅恪「溪刻陰森」這樣的過激之語是可以理解的。……《經史》一詩是陳寅恪對後來盛行的政治學習的表態之作。<sup>②</sup>

他還指出了此詩後兩句「魯論開卷語」及「說瓜」的用典。

金克木先生據親身經歷認為：

……陳詩後兩句，「競作魯論開卷語，說瓜千古笑秦儒」，不過是嘲笑大學師生忽然異口同聲，人人談學習，個個學馬列而已。倒是前兩句，「虛經腐史意何如？溪刻陰森慘不舒」，不好懂。「虛經」不知有無出處。「腐史」當然不會是通常用的指《史記》的意思。看來「虛」和「腐」都是動詞。說，把經架空，把史破壞，是什麼意思？「溪刻」用《世說新語》中典，指陳仲子行為「苛刻」……我看只好說其中有多層意思，不便明講。<sup>③</sup>

吳小如先生則說：

……首兩句蓋指全國解放之初，有些極左人士對文化遺產持虛無主義觀點，謂之「虛」、「腐」，而對高級知識分子則表面看似尊重而實際卻採取歧視乃至否定態度，當然陳寅老會感到「慘不舒」了。<sup>④</sup>

李堅先生又說：

「虛經」，當指1938年起，用六十七種語文出版，至斯大林逝世，在蘇聯重印三百次，發行四千二百萬冊的《聯共（布）黨史簡明教程》。它被稱為「馬列主

①《陳寅恪先生傳》，《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，頁217。又陳在《對科學院的答覆》中曾說：「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，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。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，再研究學術。」（見陸鍵東《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》，三聯書店1995年版，頁112）可與蔣說相證。

②《〈經史〉及其他》，《書屋》1998、1。

③《記「說瓜」》，《書屋》1998、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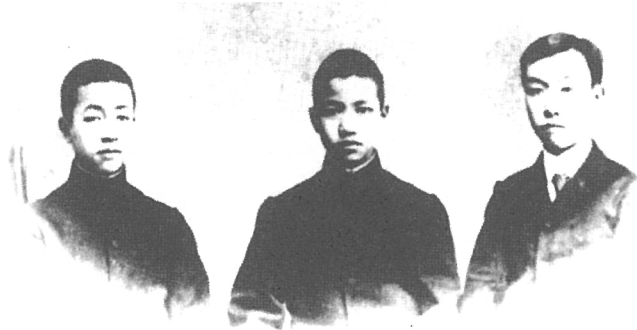
④《釋陳寅老七絕〈經史〉》，《文匯報》1998、12、30。

義的百科全書」。實際是斯大林親自參加編寫和修改、鼓吹斯大林個人迷信的黨史教科書。……「腐史」通常指司馬遷受腐刑後寫成的《史記》。這裏暗示該書是蘇聯學者在嚴刑脅迫下寫成的。書中顛倒黑白，美化蘇聯30年代的集體化和大清洗，為斯大林鎮壓、流放上千萬老黨員、幹部和農民的罪行歌功頌德。它自然難免充滿陰森之氣。<sup>⑤</sup>

他們對全詩大意的理解大致可以信從，但對具體字辭的意義，尤其是「虛經腐史」四字，則尚未解通。以下對陳詩各句分別補釋。



陳寅恪1939年攝於香港



1904年留學日本的陳隆恪（左）、陳寅恪（中）、陳衡恪（右）

### 虛經腐史意何如

「虛經腐史」四字，是全詩最難解的地方，又是詩意的首要關節，其奧妙需要間接的證據才可輾轉參透。

陳寅恪1957年在給朋友劉銘恕的信有云：

……弟近來仍從事著述，然已捐棄故技，用新方法，新材料，為一遊戲試驗（明清間詩詞，及方志筆記等），固不同于乾嘉考據之舊規，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。……<sup>⑥</sup>

陳寅恪所謂「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」為何？陸著未有說明。余英時先生則看出其中真義：

<sup>⑤</sup> 《陳寅恪晚年思想解讀》，《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頁562-563。

<sup>⑥</sup> 陸鍵東《最後二十年》轉引《敦煌語言文字研究通訊》1988年第1期《憶陳寅恪先生》，頁213。收入《陳寅恪集·書信集》，三聯書店2001年版，頁279。

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真人都是老古董，怎麼忽然變成了「新說」呢？其實陳先生這裏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碼系統。太史公是司「馬」遷，沖虛真人是「列」御寇，他其實是說，他研究歷史決不用「馬列主義」啊！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為陳寅恪也。<sup>⑦</sup>

余英時先生目光如炬，勘破玄機，此余英時之所以成其為余英時也！

由「太史公沖虛真人」的暗碼系統，可以斷定「虛經腐史」的真正所指：「虛經」，即《沖虛真經》，亦即《列子》，舊題列御寇撰——唐天寶元年詔封列子為沖虛真人，其書《列子》為《沖虛真經》——扣緊一個「列」字；「腐史」，即《史記》，司馬遷撰——司馬遷曾受腐刑（即閹割），後人故稱《史記》為腐史——扣緊一個「馬」字。所以「虛經腐史」顯然是暗指「馬列主義」，與「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」同出一轍。此即余英時所說的「因避時忌或其他原因而產生的種種隱語」。<sup>⑧</sup>

將《沖虛真經》省略作「虛經」，恐怕只是出于陳寅恪自創。如果陳寅恪沒有留下那封信，如果余英時先生沒有讀通那封信，則幾乎是不可能勘破這個迷案的。

### 溪刻陰森慘不舒

「溪刻」，《辭源》有辭條，解為「刻薄、苛刻」。語出《世說新語·豪爽》：「桓公讀《高士傳》，至於陵仲子，便擲去曰：『誰能作此溪刻自處！』」（意為：誰能對自己這麼苛刻，自討苦吃呢）」周一良先生謂：「陳先生晚年詩篇中出現的所感受的客觀環境與自己主觀心態，1950年《經史》絕句中的七個字可以概括無遺：『溪刻陰森慘不舒』。」<sup>⑨</sup>

雖然金克木先生明明已指出「溪刻」用《世說》中典，而趙星平先生不但不查《世說》，連《辭源》也不查，僅憑《辭海》中「溪卡」的辭條（藏語音譯，意為莊園，設有牢房和刑具），就說「溪刻」就是「溪卡」<sup>⑩</sup>——僅憑一本《辭海》就來做考證，其勇氣誠不可及！

又，吳小如引述了近人對「溪刻」的兩種解釋：一是舊本《辭源》云：「谿刻，謂用心深闕而行事苛刻也。」二是徐震堦《世說新語校箋》云：「溪刻即苛刻、刻薄之意。」<sup>⑪</sup>

⑦《後世相知或有緣——從〈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〉談起》，原載香港《明報月刊》1996年七月號、廣州《東方文化》1997年第一期，收入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》增訂版，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版，頁290。

⑧《古典與今典之間——談陳寅恪的暗碼系統》，《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》增訂版，頁167；又收入馮衣北《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——與余英時先生商榷》，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，頁190。

⑨《從〈陳寅恪詩集〉看陳寅恪先生》，《畢竟是書生》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，頁166。

⑩《「溪刻」試釋》，《書屋》1998、6。

⑪ 同注④

## 競作魯論開卷語

朱新華先生已指出：「『魯論開卷語』，無疑指《論語》開卷《學而》篇首句『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』。全句是說，大家競相表示，學習馬列主義，『不亦說乎』。」<sup>12</sup>這似乎還不夠精確。《論語》流傳到西漢，有《魯論語》、《齊論語》和《古文論語》三種版本，至西漢末年，安昌侯張禹以《魯論語》的根本，將魯、齊兩種《論語》合而為一，是為《張侯論》，此即後世通行《論語》之所本，所以陳詩稱「魯論」，與一般所稱《論語》並無區別——但所謂「魯論開卷語」，當是扣緊「學而時習之」中的「學習」二字。聯繫上文，意即競相學習馬列耳。

## 說瓜千古笑秦儒

此處所用典故，朱新華先生已舉出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十七引《古文奇字》一例，現補充數例。《史記正義》引顏師古云：

……衛宏《詔定古文尚書庫》云：「秦既焚書，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。而諸生到者拜為郎，前後七百人，乃密種瓜于驪山陵谷中溫處，瓜實成，詔博士諸生說之。人言不同，乃令就視。為伏機，諸生賢儒皆至焉，方相難不決，因發機，從上填之以上，皆壓，終乃無聲也。」

《太平御覽》卷八十六、卷九百七十八亦引《古文奇字》，文字比《藝文類聚》更為完整，為便參考，全引如下：

秦改古文以為大篆及隸字，國（一作周）人多誹謗怨恨。秦苦天下不從，而召諸生到者拜為郎，凡七百人。又密冬月種瓜于驪山硯谷之中溫處，瓜實成，乃使人上書曰「瓜冬有實」，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，人人各異說，則皆使往視之，而為伏機，諸生賢儒皆至焉，方相難不能決，因發機，從上填之以土，皆壓死（一作終）。

《文獻通考》卷四十亦云

……又令冬種瓜驪山，實生，命博士諸生就視，為伏機，殺七百餘人。……

以上各書，以《史記正義》最易見，或即陳寅恪所據。此句即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中共一網打盡而不自知。

綜合言之，全詩大意為：馬列主義教條（「虛經腐史」）禁錮個人生活與思想的自由（「溪刻陰森慘不舒」），知識分子（「秦儒」）競相學習（「魯論開卷語」）馬列主義，其實是自投羅網，盡入統治者的彀中（「說瓜」）。

<sup>12</sup> 同注②

五十年代初，中共統治大局已定，全國知識界開始思想改造，人人言必稱馬列，著述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為榮，陳寅恪《經史》一詩即針對此種形勢而發。1953年11月，陳寅恪的弟子汪錢到廣州勸陳北行，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，陳提出兩個條件：一、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，並不學習政治；二、請毛公（澤東）或劉公（少奇）給一允許證明書，以作擋箭牌。從此，全國學術界暗地流傳「陳寅恪公然提出不學馬列」的故事。<sup>13</sup>當時陳夫人唐筭曾對汪錢說，陳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提馬列主義，一看到就頭痛。<sup>14</sup>陳寅恪口述的《對科學院的答覆》又重申：「……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，再研究學術。」<sup>15</sup>陳寅恪對馬列主義的這些言論和態度，正可與他的《經史》相互印證。

《經史》一詩嚴厲批評馬列主義「溪刻陰森慘不舒」，所以當時陳寅恪要故為隱晦，設下障眼法，以「虛經腐史」射「馬列」二字，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政治衝擊。

關於《經史》寫作的時間，周一良先生認為一九五〇年的可能性較大，<sup>16</sup>朱新華先生進一步認為在一九五〇年暑假間後。<sup>17</sup>金克木先生則回憶，他看到陳詩大約是在廣州解放（1949年10月14日）後幾個月裏。<sup>18</sup>三聯版《詩集》則係於1951、1952年之間。

還有一點，將「虛經腐史」省略作「經史」作為詩題，當是故設迷障。但此題未必是陳寅恪自己所為，這其實尚有線索可尋。章培恆先生回憶：其師蔣天樞先生在《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》初版時曾刪去原稿一些內容，《寒柳堂集》也有同樣情形，「……先生曾給我看過幾首《寒柳堂集》未收的陳先生的詩。這些詩並非在《寒柳堂集》出版前尚未收集到，而是生恐收入後有所不便。先生當時曾告訴我具體的原因，但由於年老記憶力衰退，現在卻忘得一點影子都沒有了。只記得其中有一首的詩題似乎是《讀〈史記〉〈列子〉》，詩中對它們作了相當嚴厲的批判。我很驚訝於這樣的話何以也不宜收，先生對我作了當時很使我信服的說明，現在卻連我怎麼會信服的都記不清了。……我當時曾看到過的陳先生的這幾首詩不知是否尚存於天壤間（清華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《陳寅恪詩集》似也未收），這不能不使人繫念不置。」<sup>19</sup>

<sup>13</sup> 陸鍵東《最後二十年》頁102。

<sup>14</sup> 同上，頁109。

<sup>15</sup> 同上，頁112。

<sup>16</sup> 《畢竟是書生》頁167。

<sup>17</sup> 同注②

<sup>18</sup> 同注③

<sup>19</sup> 《〈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（增訂本）〉後記》，《編年事輯》頁259-260。

朱新華先生針對上述回憶指出，陳寅恪給劉銘恕信中所說的「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」，不過暗指「馬」、「列」二字罷了（此義由余英時先發之），而「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」與《讀〈史記〉〈列子〉》乃同一意思。<sup>20</sup>朱說甚確，但仍未達一間。我想，章先生提到的那首似乎題為《讀〈史記〉〈列子〉》的話，當即《經史》一詩！《經史》恰未收入《寒柳堂集·寅恪先生詩存》，其首句即「虛經腐史」，正與《讀〈史記〉〈列子〉》的詩題合若符節。蔣先生應知道此詩所指，故不收入《寒柳堂集》；而後來清華版《陳寅恪詩集》收入了，卻題作《經史》，我懷疑是整理者所改，也可能在傳抄時已改，以故作隱晦，否則按原題點出《史記》、《列子》兩名，就較容易被看穿是影射「馬列」二字了。章先生未注意到此詩已收入《詩集》，恐怕因為他對詩的內容已毫無印象了。

有沒有可能是另一首詩？我相信可能性很小。

此外，金先生還回憶，向達曾告訴他說，陳寅恪在瑞士時聽過列寧演講，「他可能是見過列寧的唯一中國人」。<sup>21</sup>陳是否親眼見過列寧，暫且存疑；即使他真的見過，也不是唯一的，至少尚有以下中國人見過列寧：

- 一、任輔臣夫人及子女。任輔臣1914年率領華工到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，他曾秘密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哈爾濱工人團和布爾什維克黨，在華工中建立了組織，十月革命一爆發，他即率華工投向蘇維埃一方。1918年蘇維埃政權受到舊俄白軍的反擊，1500多名華工組成中國團，任輔臣任團長，同年底在東部維雅戰場幾乎全軍覆沒，任亦陣亡。1920年，任的夫人張含光申請回國，列寧專門派車將任夫人及三名子女接到克里姆林宮會見——其中當時13歲的任棟樑至今健在，任棟樑是高級工程師，曾任保定動力學院教授，現已退休，居北京。<sup>22</sup>
- 二、劉澤榮。劉以煥先生《一代宗師陳寅恪》提及劉澤榮也見過列寧<sup>23</sup>，據陳玉堂先生《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》，他五歲隨父赴俄，畢業於彼得堡大學，後任中華旅俄聯合會會長，十月革命後任彼得格勒市蘇維埃委員，曾參加共產國際第一、二次代表大會，並受列寧接見。
- 三、江亢虎。江為中國早期社會主義宣傳者、中國社會黨創始人，他1921年曾到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，與列寧有過兩次「特別會晤」。<sup>24</sup>

<sup>20</sup> 《走向真實》，《文匯讀書周報》1997、10、18；葛兆光近時也有相同的看法，見《「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」——讀〈陳寅恪集·書信集〉的隨感》，《讀書》2001、11。

<sup>21</sup> 同注<sup>③</sup>

<sup>22</sup> 舒乙《一位見過列寧的老人》，《小綠棍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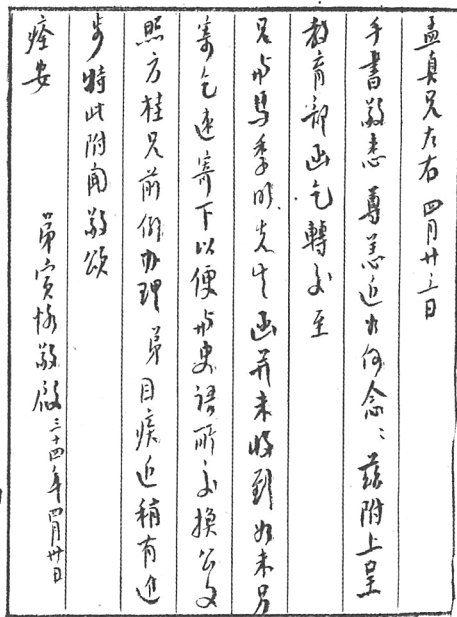
<sup>23</sup> 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，頁131。

<sup>24</sup> 曹聚仁《聽濤室人物譚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頁60。又見江亢虎本人的《新俄遊記》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）。

四、瞿秋白。據瞿秋白《赤都心史》，1921年7月6日，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上，他見到列寧，「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談幾句，他指給我幾篇東方問題材料，公事匆忙，略略道歉就散了。」

五、張國燾等。1922年初，張國燾作為中共代表參加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，期間他與張秋白、鄧培三位中國代表曾被列寧約見。張自述：「在中國共產黨中委中，我是唯一見過列寧的人。我覺得他是俄國革命的象徵，是一位純正的教主。……」<sup>25</sup>

六、柯慶施。曾任江蘇省省委書記、上海市市委書記、政治局委員、副總理，毛澤東曾對他的私人醫生講：「在中國共產黨內，親眼看見過列寧的就是柯老一個人，那時他在蘇聯東方大學讀書。在一次群眾集會上，看見了列寧。……」<sup>26</sup>



陳寅恪1945年4月30日致傅斯年函

附呈教育部高等教育局函

<sup>25</sup> 張國燾《我的回憶》，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一冊頁197-200。

<sup>26</sup> 李志綏《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》，台灣時報出版公司1994年版，頁193。



## 痛斥《中國通史簡編》

陳寅恪五十年代初有詩《題洗玉清教授修史圖》，本來共有三首，第一、三兩首《寒柳堂集·寅恪先生詩存》<sup>27</sup>和《陳寅恪詩集》<sup>28</sup>旨已收入，茲不述。三首詩原由陳夫人唐筭代筆，題於吳湖帆所繪的《琅玕館修史圖》（原件現藏廣東省文史研究館），未收入的第二首如下：

國魄銷沉史亦亡，簡編桀犬恣雌黃。著書縱具陽秋筆，那有名山淚萬行。  
此詩最早由張求會先生公佈，<sup>29</sup>後已收入三聯版《陳寅恪集·詩集》。<sup>30</sup>此詩原來未收入《詩存》及《詩集》並不是因為遺漏，而顯然是因為內容違礙。<sup>31</sup>以下對各句分別解釋。

### 國魄銷沉史亦亡

「國魄」當即「國魂」，只不過「魂」字在此處不符詩律，故以意義相近的「魄」字代替耳。「國魂」一詞似不見於近代以前，至少是近代才開始流行的。20世紀初年，喚「國魂」乃一時風氣，尤為宣傳革命的國粹派所習用，如梁啟超詩《讀陸放翁集》：「詩界千年靡靡風，兵魂銷盡國魂空。」蘇曼殊詩《無題》：「水晶簾卷一燈昏，寂對河山叩國魂。」何謂「國魂」？蔡鍔《軍國民篇》云：「國魂者，國家建立之大綱，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。其於國民之關係也，如戰陣中之司令官，如航海之指南針，如槍炮之照星，如星辰之北斗。」許之衡《讀〈國粹學報〉感言》云：「國魂者，立國之本也。」高旭《南社啓》更謂：「國有魂，則國存，國無魂，則國將從此亡矣……然則國魂果何所寄，曰寄於國學。故存國魂，必自存國學始。」<sup>32</sup>所以，「國魂」是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柢精神。——這種用法，似非傳統漢語固有，我很懷疑是受了日本的影響所致。日本不正有所謂「和魂」的語辭嗎？

「國魄銷沉」云云有特殊的深意。此詩作於五十年代初，<sup>33</sup>正值中共政權成立未幾，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全面向蘇聯「一邊倒」，陳詩正是針對此時的氣候而言，認為「一邊倒」的政策已導致中國本位文化和精神的喪失，而作為這種本位文化和精神之象徵的史學也同時衰亡。據吳宓1961年8月3日日記，陳寅恪在跟他會面時論

<sup>27</sup>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<sup>28</sup> 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。

<sup>29</sup> 《〈題洗玉清教授修史圖〉補遺》，《讀書》1998、5；《〈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〉（增訂本）之增訂》，《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頁642。首句「魄」誤作「魂」，「銷」誤作「消」。

<sup>30</sup> 第二句「恣」誤作「滋」。

<sup>31</sup> 蔣天樞曾特別提到此詩，見《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（增訂本）》頁188。

<sup>32</sup> 參鄭師渠《晚清國粹派——文化思想研究》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，頁116-117。

<sup>33</sup> 清華版《詩集》注明寫於1951年1月，三聯版則未明確注明，而係於1951、1952年之間，《編年事輯》則係於1950年。

及時政，表示：「……中國應走第三條路線，獨立自主，自體其民族之道德、精神文化，而不應一邊倒，爲人附庸。」<sup>34</sup>可與陳詩此處相參證。

此外，據現代詞學家夏承燾1951年7月16日日記載：「晨季思（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王超）來，談熊十力先生在北京近況。此老謂中國新興氣象爲歷史所無，但慮中國將亡於蘇聯。……」<sup>35</sup>熊十力的憂慮正與陳寅恪的感慨相呼應。

「史亦亡」云云則是陳寅恪早年觀念的延續。陳1929年《北大學院己巳史學系畢業生贈言》詩有云：「群趨東鄰受國史，神州士夫羞欲死。」這兩句詩的內涵，在他1931年所撰的《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》有更清楚的表述：「東洲鄰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銳進之故，其關於吾國歷史之著作，非復國人所能追步。昔元裕之、危大樸、錢受之、萬季野諸人，其品格之隆汗，學術之歧異，不可以一概論；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，即國可亡，而史不可滅。今日國雖幸存，而國史已失其正統，若起先民于地下，其感慨如何？」<sup>36</sup>20世紀前期中國學術受日本學風影響甚巨，陳氏因此以爲中國史學已失其正統，故當時有國存史亡之嘆；而降及五十年代，中共全面向蘇聯「一邊倒」，從政治到文化，從制度到思想，無不以崇共崇蘇爲尚，其程度已達非當年崇尚日本的風氣所能及，陳氏對此自必痛心疾首——故早年仍只是稱「國史已失其正統」，而此時更直謂國史已亡矣！

另，楊樹達1954年3月28日日記云：「姚薇元書來，云寅恪以多病辭不北行，舉陳垣自代。且寅老不滿意於科院（科學院），謂解放數年，絕不重視史學，至此老成凋謝之際，乃臨時抱佛腳，已有接氣不上之象云云。」<sup>37</sup>亦可與陳氏此詩相關發。

### 簡編桀犬恣雌黃

此句是全詩的要點所在。「簡編」本是舊辭，泛指書籍，陳寅恪詩《有感》「一代簡編名字重」就是用這種古義，但根據上下文，此處應當另有所指。我覺得當指《中國通史簡編》一書，正承首句史學消亡而言。「桀犬」語出《史記·鄒陽列傳》「則桀之狗可使吠堯」，意爲昏君夏桀的狗也會向聖明天子唐堯亂吠，指走狗只爲主人效命，亦指各爲其主；成語多作「桀犬吠堯」，也作「跖狗吠堯」、「桀犬吠舜」或「紂犬吠堯」。陳詩此句斥《中國通史簡編》一書是御用史學，是專爲共產黨作宣傳和批判的政治工具，它的出現是中國史學衰亡的表徵。<sup>38</sup>

<sup>34</sup> 《吳宓日記》，北京三聯書店，1998年版。

<sup>35</sup> 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、《夏承燾集》第七冊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、浙江古籍出版社，頁181。

<sup>36</sup> 《陳寅恪集·金明館叢稿二編》，三聯書店2001年版，頁361—362。

<sup>37</sup> 《積微居回憶錄·積微居詩文鈔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頁382。

<sup>38</sup> 陳寅恪對《簡編》的痛斥並不是孤立的，據說繆鳳林在四十年代就已將《簡編》批得一無是處，原文未見。

按：《中國通史簡編》由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直接指示范文瀾主持編寫的，1941年完稿，1943年在延安印行，毛澤東當時高度評價說：「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。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，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。」至1951年，《簡編》已先後印行了8版。陳寅恪所看到的即此延安版。——需要說明的是，延安版《簡編》並不是作為范文瀾的個人著作印行的，幾乎一律署「中國歷史研究會編」，其中參與編纂的凡七人，但范分別參與了各編的寫作，並任總編，因此全書實由其總其成。以後范文瀾對《簡編》重作修訂，才以個人名義再版，累積印數達數百萬冊，為近五十年影響最巨的一部中國通史。

陳詩涉及《中國通史簡編》實非偶然，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注意到此書。陳寅恪1944年10月3日有一封給傅斯年的信云：「……如將有西北之行。此函達渝，示識已啓程否？此行雖無陸賈之功，亦無酈生之能，可視為多九公、林之洋海外之游耳。聞彼處有新刊中國史數種，希為弟致之，或竟向林、范諸人索取可乎？『求之與抑與之與』，縱有誤讀，亦有邢子才誤書思之，亦是一適之妙也。」<sup>39</sup>《書信集》編者和朱新華先生對此信各有相當細緻的解釋和修正。「西北之行」指傅斯年1945年7月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；「酈生」即酈食其，與陸賈同為劉邦的使者和說客，都有說服地方割據勢力歸附漢朝之功，故以比擬傅斯年等國民黨政府派遣去延安的社會賢達；多九公、林之洋是《鏡花緣》中周遊海外的人物；「求之與抑與之與」原出《論語·學而》，《鏡花緣》中的人物因形近而誤讀為「永之興柳興之興」。——最值得注意的當然還是信中提到的「彼處有新刊中國史數種」，當即指《中國通史簡編》一書；林當即林伯渠，與陳氏是早年留學同學和舊同事，范即范文瀾。雖然不清楚傅斯年後來是否代陳氏索取到《中國通史簡編》，但至少表明，陳對其書早有留意，後來閱讀、批評此書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
此外，據周一良先生回憶：「北京解放後不久，范老囑我寫信給陳先生，代他致意，陳先生沒有反應。」<sup>40</sup>這裏的「范老」當即范文瀾，陳寅恪對這位紅朝史學新貴的问候未予回應，這與陳詩對其書的痛斥是相呼應的。

<sup>39</sup> 此信《陳寅恪集·書信集》原係於1929年，三聯書店2001年版頁36-37；朱新華先生根據信的內容考訂，係於1944年，見《談陳寅恪致傅斯年第十六函》，《中華讀書報》2001、11、21；編者亦已更正，見《陳寅恪集·書信集》補正》，《讀書》2001、11。

<sup>40</sup> 《從〈陳寅恪詩集〉看陳寅恪先生》、《畢竟是書生》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，頁165。

## 著書縱具陽秋筆

「陽秋」亦即《春秋》，晉時避簡文帝鄭太后阿春諱，「春」一律改稱「陽」，故「陽秋」實即「春秋」，泛指史書，又引伸指史書之直筆。錢謙益《與吉水李文孫書》中有云：「大闡定哀之微詞，一洗陽秋之典筆。」清人孫枝蔚詩《廣化寺謁忠烈祠步吳梅村韻》之三：「何人直筆擅陽秋，可惜清流葬濁流。」又，晉孫盛著《晉陽秋》，亦即《晉春秋》，此書直筆實錄，觸怒當道，也無愧「陽秋」之名；其子輩重作刪改後才敢傳佈，孫盛自己寫出兩個定本寄給友朋，這個定本多年以後在遼東重新得到，與一般通行的版本多有不同。陳寅恪《廣州贈別蔣秉南七絕二首》之一「孫盛陽秋海外傳」、《論再生緣校後記後序》「孫盛陽秋，同是遼東之本」即用此典。

## 那有名山淚萬行

「名山」典較常見，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「……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師，俟後世聖人君子。」又《漢書》載司馬遷《報任安書》：「僕誠已著此書，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……」三四句意為：縱使有《春秋》那樣的史筆，又有什麼辦法能夠將著作傳之後世呢！據說陳寅恪本來有意寫一部《中國通史》及《中國歷史的教訓》<sup>④①</sup>，或許這也是他如此關注中共方面《中國通史》一書的原因吧；但五十年代以後，學術界已是「欲採萍花不自由」，他已失去寫作一部非官方化的《中國通史》的條件，故有此名山無覓之嘆。

陳寅恪此詩直斥官方史學，於當時可謂「謗詩」，這正是原來未收入《詩存》、《詩集》中的原因。

最後還想說些題外話。最早公佈此詩的張求會先生不久前出版了《陳寅恪的家族史》一書，<sup>④②</sup>讀書行路，用力甚勤。此著與陸鍵東先生的《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》兩書，可稱近年關於陳寅恪的兩大著作，一考其先世，一述其晚境，皆為陳寅恪研究不可少的工作。陳寅恪晚年長住嶺南，這兩部著作都由於身在廣州的作者之手，則廣州的知識界還不算丟臉。所可惜者，《家族史》一書至陳三立止，關於陳寅恪同代人的歷史仍有待增補。

④① 俞大維《談陳寅恪先生》、《談陳寅恪》，傳記文學出版社，民國67年版，頁11-12。

④② 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。

對於陳寅恪，廣州中山大學至今已開了三次學術研討會，並分別出版了三部論文集，<sup>45</sup>也算鄭重其事。但這其實只是份內的事。而且，這三部論文集的內容都完全重在討論陳寅恪的「學術」，而對其晚年心境和政治態度明顯地有所迴避——這方面的工作，倒是讓陸鍵東先生這個中大之外的有心人做出來了。可是，自《最後二十年》一紙風行，據說陸先生已不能在中大查閱檔案了；甚至連中大的出版社想請他寫一部中大野史，也因此無法可想。

我個人的感覺，當前學界對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和文化精神已有推重過份之處（言必稱陳寅恪，陳寅恪言必精當），而對他的政治心態的細緻闡發尙嫌不足。我們後死有責。



陳寅恪1935年7月10日致傅斯年函，詢及應否出席中研院第一次中評會

<sup>45</sup>《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》，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；《〈柳如是別傳〉與國學研究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；《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。